

# 平台经济全球化的资本逻辑及其批判与超越\*

韩文龙

**【内容提要】** 平台经济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产生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逻辑推动着平台经济进行全球化扩张，影响着其发展进程、组织形式、矛盾困境与内在超越。平台经济全球化修复了资本循环的时空链条，正在重塑生产资料与劳动结合的方式，影响着一般性生产关系和“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局部变革。在数字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和基本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了，使得剥削、收入差距、垄断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使得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公平问题日益突显。为了实现数字经济的共享发展，我们必须超越资本逻辑，倡导“共建共享共治”的合作发展逻辑。在数字经济的全球治理层面，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将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新发展格局中，为了应对具体挑战，中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积极维护好国家安全和利益。

**【关键词】** 资本逻辑 平台经济 经济全球化 生产的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韩文龙（1984-），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成都 611130）。

当今世界，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字经济时代，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已经成为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新趋势。数字经济代表着新的经济发展方向，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不断增加。平台经济是以现代通信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由数据采集、数据驱动、平台支持、专业分工、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所构成的新组织或新交换系统，它链接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多个环节，形成了新经济关系。平台经济全球化修复了资本循环的时空链条，正在重塑生产资料与劳动结合的方式，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深刻认识和理解平台经济全球化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数字企业和国家利益关系重大，其直接影响中国平台型数字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国家利益，需要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 一、资本是驱动平台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

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全球化分工体系和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形成的根本性驱动因素是资本，资本逻辑是驱动平台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0FJLB006）的阶段性成果。

方式”<sup>①</sup>，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sup>②</sup>。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sup>③</sup>，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支配着其他生产要素和劳动者，通过组织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创新价值实现方式，不断追求资本增殖。这就是资本逻辑，其运动过程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资本是一系列的使用价值，是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生产要素，这是它的物质属性。另一方面，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sup>④</sup>，这是它的社会属性。资本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是辩证统一的。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资本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使得资本在遵循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基础上不断释放强大的力量，推动社会再生产方式的内容变革、组织变革以及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变革。

从资本逻辑看，资本的本质是要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sup>⑤</sup>。在数字技术体系下，资本也需要遵循这个绝对规律。资本需要实现对“社会整体雇佣劳动者”劳动力的购买和占有，参与资本之间的市场竞争，企图占有绝大部分劳动产品，实现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向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转变。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结合的过程，也是价值增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开始支配和使用可以产生使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自然力”。这种“自然力”包括依赖于人类生命体的劳动力、依赖于自然资源的“自然力”和依赖于人们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形成的生产力<sup>⑥</sup>。在平台经济中，资本逻辑的具体表现就是资本支配和使用这三种“自然力”来追逐更多剩余价值。只不过，这三种“自然力”具有新的技术和关系特征。

首先，在平台经济中由于劳动形式的复杂化，资本支配和使用的劳动力逐渐演变为“总体工人”的劳动力。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过程逐渐呈现数字化新趋势，具体可以概括为四种表现形式：传统雇佣经济领域下的数字劳动过程、互联网平台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动过程、数字资本公司技术工人的数字劳动过程和非雇佣形式的产销型的数字劳动过程<sup>⑦</sup>。这些劳动过程，前三种是有偿劳动，后一种是无偿劳动。随着数字技术体系跨时空和跨国界的快速发展，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范围更广了，深度也更深了。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必然要求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与之相“配合”，即它要求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都必须成为资本支配和使用的对象。平台经济正好可以借助网络技术跨越国界，连接世界范围内的各类劳动者。尽管这些劳动者中有些是正式雇佣的劳动者，有些是临工劳动者，有些是“玩劳动”<sup>⑧</sup>或自我产销型的劳动者，但是他们都是“社会总体工人”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和地区范围的“社会总体工人”逐渐演变成了“国际性社会总体工人”。所以，在平台经济中，资本剥削的不仅仅是其直接雇佣的劳动者，而且包括其间接雇佣的“社会总体工人”和“国际性社会总体工人”。

其次，在平台经济中，资本所支配和使用的依赖于自然资源的“自然力”具有独特性。在传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9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7-87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9页。

⑥ 参见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趋向——从阶级阶层结构到和谐社会建构》，《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

⑦ 参见韩文龙、刘璐：《数字劳动过程及其四种表现形式》，《财经科学》2020年第1期。

⑧ “玩劳动”是指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载体，在数字经济领域存在的具有休闲娱乐性质的数字活动。

经济中，自然资源的“自然力”主要来源于风力、水力、矿藏和土地肥力等。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是关键生产要素，现代信息网络是重要载体，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是重要手段。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中各种经济联系的综合体，其使用的自然力主要是基于数字技术体系的知识和信息形成的，这种自然力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力，而是人造自然力或者是社会自然力。

在平台经济中，资本通过搭建电子化的交易平台，向前联结了众多生产者，向后联结了众多消费者，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双边市场结构<sup>①</sup>。大资本只要对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大数据信息进行垄断，就可以获得排他性的市场地位。在平台组织内部，一方面，大资本可以利用数字化垄断优势支配平台前端的众多生产者和卖家，使得接入平台的生产者和卖家所使用的“自然力”也变为平台可以间接支配的自然力。尤其是信息网络等服务业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sup>②</sup>，可以进一步扩大平台经济的支配范围。另一方面，大资本可以利用大数据和算法优势支配平台后端的消费者，使得接入平台的消费者间接成为“玩劳动”或自我产销型的劳动者，通过体验和评论等支持平台建设。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实际上也在利用自己掌握的“自然力”间接地为平台经济服务。平台经济之间，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内在动力下和外在竞争压力下，借助于现代金融技术和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实现资本集中。尤其是国际性股票市场可以实现资本在短期内大规模集中，形成国际性平台组织。国际性平台组织借助于全球范围内数字基础实施的互联互通，可以支配和使用的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更广泛了，进而形成了国际性的垄断平台。

最后，资本支配和使用的依赖于人们劳动过程中由分工与协作关系形成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经济本质上是以数字技术体系为主要支撑的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一个局部的“总体生产组织”<sup>③</sup>。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更大范围的分工和协作。一般来讲，劳动过程一般包括三个简单的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sup>④</sup>除此之外，随着劳动过程的发展，管理、分工协作、科技的发明和使用等都会作为新要素加进来<sup>⑤</sup>。在平台经济的劳动过程中，不仅劳动的三要素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新要素与传统要素有机结合后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平台经济所实现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已经突破了亚当·斯密等所讲的企业内、行业内和市场内的分工和协作，逐渐形成了跨越时空和国界的国际性分工和协作体系。在资本逻辑驱动下，这种分工体系将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数字技术体系、基于全球市场的网络化生产和销售体系、基于劳动者新技能与新兴生产资料相互结合的劳动过程相互融合，实现了生产要素市场、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全球性协作，加速了资本的流通和周转。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协作这种社会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是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sup>⑥</sup>。在平台经济的全球化扩张过程中，资本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在平台经济中，资本不仅可以支配和使用“自然力”实现全球性扩张，让“社会总体工人”和“国际性社会总体工人”不断创造价值，还可以通过信息化的支付工具、现代化的物流仓储技术、体验和嵌入式的广告营销手段和现代化的消费金融工具加速价值的实现。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产业资本占据主导优势，后工业化时代金融资本不断崛起，当今信息化时代商业资本凭借平台经济正在快速崛起。数字技术体系的发展和运用为商业资本的崛起提供了技术途径，平台经济的形

① 参见李晓华：《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改革》2019年第11期。

② 参见江小娟、罗立彬：《网络时代的服务全球化——新引擎、加速度和大国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③ 参见王彬彬、李晓燕：《互联网平台组织的源起、本质、缺陷与制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⑤ 参见马驹、卫兴华：《用唯物史观科学把握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97页。

成为商业资本的崛起提供了组织基础。凭借强大的聚合能力，平台经济可以将闲置的货币资本、过剩产能、失业或不完全就业的劳动者、剩余商品等聚合在一起<sup>①</sup>。通过资本循环在时空上的修复，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找到新的出路。全球性的商品链、价值链、创新链和生产网络为商业资本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基础。平台经济的崛起，一方面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和加速资本循环促进了商品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流通环节的垄断。平台经济凭借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和大数据信息，成为流通环节的控制者。千千万万的生产者和卖家都需要接入平台来完成商品销售，他们必然要接受商业资本的控制和剥削。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和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金融资本的新垄断、美元和知识产权的新垄断、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等特征<sup>②</sup>。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sup>③</sup>。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新垄断对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列宁在对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论述中指出，通过“参与制”，银行等金融机构就可以实现对股份公司等的控制，进而增加垄断者的权力，获取较高的利息和股息收入等<sup>④</sup>。平台经济是实现新垄断的重要中介，金融垄断资本通过风险投资、入股、参股和公司上市等途径可以助推平台规模实现快速扩张。尤其是全球金融市场为平台经济全球化扩张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加快了资本循环速度，扩大了资本增殖规模，导致了国际垄断平台的形成。例如，凭借股票市场形成的资本集中效应，谷歌母公司字母表（Alphabet）的市值曾达到1万亿美元，谷歌作为搜索引擎平台公司，在全球的搜索引擎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同时，谷歌公司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本集团凭借资本权力和政治影响力干预政治和司法，作为“大而不能拆分”的巨型公司享受着巨额的垄断利润。

## 二、资本驱动下平台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关系透视

平台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深刻改变了生产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结合方式，使得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的转变更加彻底，另一方面也加快了数字财富的积累，带来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

### 1. 一般性生产关系

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sup>⑤</sup>。在资本逻辑视角下，对平台经济全球化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必然要涉及生产关系问题。狭义的生产关系就是直接生产过程的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则是一个体系，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过程中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等<sup>⑥</sup>。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平台经济仍然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运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决定着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等。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转向，平台经济中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由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

①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New York: Verso, 2006, p. 85.

② 参见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③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7页。

④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2页。

⑥ 参见马昀、卫兴华：《用唯物史观科学把握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资本的所有者、持有公司股票的劳动者和拥有社会资本的股民等联合起来的集合体。随着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联通作用，这个集合体往往是全球性的。在这个集合体中，谁占有相对优势地位，谁就将决定平台经济中的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从全球主要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发展情况来看，机构性质的金融资本所有者往往是最后的实际控制人。这就决定了平台经济的分配必然是优先考虑各类大资本所有者，尤其是金融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但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转向，也使得通过劳动或其他方式获得部分资本的知识型和管理型劳动者以及社会中的普通股民也可以获得部分的增殖收益。

数字技术体系的发展正在改变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结合方式。在数字经济时代，出现了大量的零工和产销型劳动者，他们可能是拥有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也可能是拥有部分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通过网络平台的聚集效应，他们直接或间接加入了平台经济的生产过程。在平台经济中，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和基于供产销产生的大数据信息是关键性的生产资料。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出现了多样性：第一种是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拥有的关键性生产资料结合，这是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型的生产方式。这属于平台经济中雇佣关系结构的底层，如从事平台外围工作的劳动者，他们往往只能通过出卖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获得一般的工资性收入。第二种是拥有部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拥有的关键性生产资料结合，这是资本半雇佣劳动型的生产方式。这属于平台经济中雇佣关系结构的中间层。例如，一些汽车共享平台中，司机用私家车接入平台，通过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共同获得收入。第三种是个别拥有重要知识型生产要素的劳动者与拥有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结合，这是劳资共享型的生产方式。这属于平台经济中的中上层。平台经济中的高层管理者、高级工程师和科学家等知识性劳动者，主要通过独特的知识技能获得收入。第四种是拥有部分关键性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拥有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结合，这是资本共享性的生产方式。这属于平台经济中的上层，本质上是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合作。如产业资本所有者、商业资本所有者和金融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合作，其中既有企业家才能的合作，更多的是资本之间的合作。随着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平台资本凭借数字经济体系的跨时空和超越国界的特性，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者。资本逻辑推动的平台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全球化配置提高了生产效率，资本循环得到了时空上的修复，为剩余价值创造和实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则造成地区间生产力布局的不平衡，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及全球范围内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使得仅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劳动者陷入了更加严重的“相对贫困”。

以数字技术体系为基础设施的平台经济正在重塑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交换关系。一般来讲，生产决定交换，生产的性质决定交换的性质。生产越发达，交换的范围就会越广。反过来，交换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实现。马克思讲过“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sup>①</sup>。平台经济既是以数字技术体系为主要支撑的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局部的“总体生产组织”，更是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局部的“总体交换组织”。平台经济的崛起，带来了新的交换方式，将传统的线下交换逐渐转变为线上交换。交换的主体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二元主体转变为生产者、平台和消费者的多元主体，交换的媒介由信用货币逐渐转变为电子货币和数字货币，交换的组织形式由传统的场所式集市和商场转变为网络化的信息平台，交换的标的物由传统的商品和服务转变为更加多元化的内容，如基于个人偏好的数据和信息等。全球化的商品生产体系、贸易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体系、投资体系和金融体系，进一步便利了平台经济范围的扩张。此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交换关系已经突破了企业、行业、地区和国家的范围限制，成为世界性的交换关系。平台经济促进了世界性交换关系的形成。只不过，在世界性的交换关系中仍然存在两大不平等交换。一是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占有和分配劳动产品的不平等交换，二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中心-外围”式的不平等交换。

以数字技术体系为基础设施的平台经济使得分配关系日趋复杂化。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涉及生产条件的分配和收入分配两个层次<sup>①</sup>。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了收入分配的结果。生产条件是进行生产和创造财富的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的生产资料，客观的生产条件，另一方面是活动着的劳动能力，有目的地发挥出来的劳动力，主观的生产条件。”<sup>②</sup> 生产条件的分配主要由生产条件所有制的性质决定，同时受到具体经济制度和产权制度的制约。在平台经济的分配过程中，仍然遵循按照生产条件分配的基本原则。但是，物质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平台通过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将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厂商和卖家、拥有部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自雇型劳动者或仅拥有劳动力所有权的它雇型劳动者以及纯消费者和产销型的消费者聚合在平台上，使得物质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更加多元化，分配方式也更加多元化。在平台经济中，劳动产品的分配一方面取决于价值产生的规模和价值实现的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物质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和比例，同时受到市场竞争程度和资源稀缺程度的影响。

在平台经济的收入分配中，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尤其是资本的所有者仍然占据优势地位，获得了较多的收益。平台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得拥有不同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的所有者比较容易地接入平台，参与世界范围内的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体系，获得一定的收入。另一方面，平台的资本所有者通过股份制和跨国上市等形式不断扩张平台规模，实现了巨额财富的快速积累。实际上，这是平台经济的“马太效应”，将会带来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 2. 生产的国际关系

一般来讲，马克思主要是从国内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但是，马克思也非常重视“生产的国际关系”。他讲过“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sup>③</sup>。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提到“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sup>④</sup>，并为此专门制定了研究和写作计划。尽管这些宏伟的写作计划没有最终实现，但是马克思提出的“生产的国际关系”成为研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重要理论工具。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针对20世纪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并指出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面对以资本逻辑推动的平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国际关系新变化，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平台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使得平台经济部分具有了马克思所讲的“生产的国际关系”属性，同时以垄断平台为核心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了列宁所讲的霸权国家和金融资本等瓜分“势力范围”的蕴意。

在平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生产的国际关系”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借助于全球化的生产网络、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和市场体系，平台经济使得资本推动的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范围变为世界性的

① 参见洪银兴、葛扬等：《〈资本论〉的现代解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8-4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页。

了,其在促进国际分工和协作体系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发生新变化。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平台组织之间存在动态的不完全竞争关系。平台组织与非平台组织存在支配—依赖关系,大小平台之间形成了控制与依赖紧密结合的动态嵌套层级结构,大型平台之间存在着垄断竞争关系<sup>①</sup>。平台经济全球化将这种不完全竞争关系延伸到了世界主要国家平台组织之间的竞争领域。

二是主权国家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支持逐渐转向了干预和限制。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巨型平台公司凭借垄断地位和优势,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造成了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目前,一些垄断平台公司已经形成了对本国政府公权力的“挤压”,通过网络和媒体的放大效应正在“消解”政府传统的控制领域和影响力,造成了国家治理的部分失灵。同时,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垄断平台公司可以获取海量的公民隐私数据,这带来了大数据安全隐患问题。例如,谷歌、脸谱等公司多次被暴露侵犯和泄露私人隐私信息。为此,美国政府要求谷歌、脸谱等公司加大保障数据安全和公民隐私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并对泄露隐私数据的公司进行巨额罚款。

三是主权国家之间围绕数字经济领域展开的经贸利益博弈加剧。数字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在发达国家有4/5的人使用互联网,而不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仅为1/5,同时非洲和拉丁美洲拥有的主机代管数据中心的总量占世界总数的比例在5%以下<sup>②</sup>。“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之间的这种数字鸿沟会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均和发展的不平衡,也会影响世界经贸格局的变化。

主权国家之间围绕跨国平台公司的矛盾日益激化。矛盾主要集中在发展权利、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税收利益分配问题上。这些矛盾的根源是由于垄断资本的输出对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破坏力。列宁指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sup>③</sup>。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输出资本的国家已经把全世界瓜分了”<sup>④</sup>。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瓜分”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市场的工具和武器是平台公司。美国作为世界范围内平台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拥有的跨国平台公司控制着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最大资源和市场,这不利于其他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权利、发展利益和发展安全的实现。因此,其他国家势必针对美国等国家的平台公司采取限制性措施,以维护相关经济利益。

### 三、平台经济全球化与资本积累矛盾的新变化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一方面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劳动者陷入了相对贫困的境地。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积累是平台经济这种新经济形态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也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积累矛盾发生新变化的过程。从资本驱动平台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我们重点从剥削、收入分配、垄断和基本矛盾等方面来阐释这些新变化。

首先,平台经济重塑了资本的价值剥削体系,扩大了价值剥削范围。马克思指出,“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受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

① 参见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② 参见《让更多人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人民日报》2019年9月9日。

③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6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31页。

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sup>①</sup>。这种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就是剥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平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资本剥削体系。平台经济通过众包、外包和零工等形式将越来越多的数字工人、知识工人和“玩劳动者”等社会大众纳入社会总生产过程，实现了资本剥削范围的扩大化。资本既实现了对正式雇佣劳动者的剥削，也将没有正式雇佣关系的众包、外包、零工中的劳动者纳入了剥削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金融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劳动产品的需求由物质产品更多向精神产品转向。劳动产品范围的拓展，使得资本可以支配和使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更加多元化，资本剥削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一方面，金融业和物流业的发展使得资本可以通过对社会协作的剥削来榨取价值，既对劳动者进行剥削，也对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进行剥削<sup>②</sup>。例如，农业、餐饮、住宿、文化产业等都被纳入了平台资本的剥削体系。另一方面，数字化劳动的出现，使得剥削方式越来越隐蔽化，剥削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化，逐渐形成了以大工业和商业平台的正式雇佣关系为中心，无酬劳动和隐性劳动为边缘、各种新的剥削形式为补充的剥削格局<sup>③</sup>。平台经济更容易通过社会分工和协作体系将其他行业纳入其统御范围，也更容易形成多层次的剥削格局。尤其是平台经济中，消费、娱乐、社交等行为与单纯的生产界限被打破了，消费者可能就是潜在的产销型生产者，社会大众可能被纳入产业后备军范围，全球的普通网民可能就是“去劳动关系化”的潜在雇佣工人<sup>④</sup>。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和平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这种新型剥削方式的创新，使得资本的价值剥削范围更广了、程度更深了。

其次，平台经济在实现“共享”发展的同时，也容易产生收入分配的皮凯蒂效应<sup>⑤</sup>。共享经济是将闲置资源和使用权通过特定的信息平台和数据链将供给者和使用者有效结合起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一种新经济模式。共享经济分为利润导向性和非利润导向性两种。从亚马逊、优步、爱彼迎等公司发展来看，平台经济更多是一种利润导向性的交换平台，也是资本主导型的平台。“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sup>⑥</sup>。在这样的平台中，资本和劳动关系发生了新变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去劳动关系化”。“去劳动关系化”过程中，由于众包、分包、临工和产销型劳动者的大量出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过程中劳动力在劳动关系形式上不直接从属于平台资本，传统的劳资契约关系弱化或隐性化，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劳动法的有效保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平台经济形成的雇佣关系，不仅形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还导致了正式雇佣劳动者与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对立。这会导致平台经济中劳资之间的矛盾社会化，以及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正式雇佣劳动者和非正式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甚至形成皮凯蒂分配效应。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总结了英、法、德、美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收入分配规律，指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会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sup>⑦</sup>。利润导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2页。

② Sandro Mezzadra et Brett Neilson, “Entre Extraction et Exploitation: Des Mutations en Cours Dans L’organisation de la Coopération Sociale,” *Actuel Marx*, No. 63, 2018.

③ 参见张春颖：《法国理论界对资本主义剥削问题的阐述——以〈今日马克思〉杂志为中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6期。

④ 参见刘皓琰：《信息产品与平台经济中的非雇佣剥削》，《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⑤ 参见常庆欣、张旭、谢文心：《共享经济的实质——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

⑦ 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向性的平台经济，势必会形成有利于资本的财富分配结构。凭借现代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社会化的资本集中，平台经济可以短期内做大做强，同时创造出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平台经济通过强大的资源聚合能力，实现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但是却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钳制下的两极分化问题。

最后，平台经济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演绎了垄断的新形式。关于资本主义的垄断问题，列宁做过经典论述。他指出：“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sup>①</sup> 平台经济中的垄断是由竞争转化而来的。平台经济将相关行业中的各类生产者、卖家和消费者等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规模经济，同时借助于现代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平台能够快速实现资本的集中，形成竞争垄断或寡头垄断的格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逐利性和多种资本的联合是导致垄断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剩余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平均化趋势规律作用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平均利润率可能会下降。但是平台通过增加投资，实现更大规模的资本集中，可以扩大利润总额。个别资本通过资本集中形成的垄断还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平台经济中的垄断，既是资本积累过程金融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积累过程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工具的创新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闲置的各类资本可以进入金融市场成为潜在的预付资本。平台企业通过股票上市等方式可以获得这些闲置资本的使用权，并投入平台的运作，逐渐形成资本所有权社会化的大平台。但是，考察世界上主要的平台经济跨国企业，持有原始股的创业者、战略投资者、各类基金公司等往往是平台的实际控制者。通过关键性的投票权，他们就可以通过相对集中的个别资本控制分散的社会资本，进而控制整个平台。列宁对此作出精辟的概括，即“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sup>②</sup>。

“世界市场总体”的形成使得平台经济的范围扩张到了世界各地。借助于互联互通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平台经济可以更加方便地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和分配各类自然资源、产品、劳动力和资本。资本的逐利性，迫使那些“信息穷国”开放贸易区域和本国市场，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廉价的初级产品、半成品和劳动力，同时成为平台经济的消费者，其国家的产业发展也被锁定在低端。而“信息富国”的资本通过控制平台，使得本国产业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的平台经济垄断是资本主导的国际性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垄断是资本竞争的必然结果，垄断必然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的各类矛盾。正如列宁所言，“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且处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这种一般环境始终有无法解决的矛盾”<sup>③</sup>。当然，“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没有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很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sup>④</sup>。

最后，平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深化。信息技术革命和垄断资本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2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0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0页。

全球扩张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sup>①</sup>。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有了新变化。平台经济作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缩短了资本循环时间，创造出了庞大的数字财富。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财富差距扩大使得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或增长缓慢。平台经济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头部效应等更容易实现资本和社会财富的集中。以美国为例，亚马逊的贝佐斯等数字公司的开创者成为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美国财富加速向 1% 甚至 0.1% 的超级新贵集中，而中产阶级与他们的差距不断拉大<sup>②</sup>。

二是平台经济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尽管平台经济将供应、生产和销售等环节连接在一起，促进了生产社会化，提高了交换效率，提升了平台经济内部生产和交换的有组织性，但是平台经济联结的各个生产部门或企业还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市场中的生产相对过剩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垄断，进一步激化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三是平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瓜分数字经济世界市场和争夺数字经济红利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利用数据和前沿技术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心—半外围—外围”结构中的地位。处于中心地位国家的跨国数字公司凭借庞大的国际垄断资本、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全球化的市场需求获得垄断利润，而处于半外围和外围国家的民族资本则往往处于竞争劣势。在当今世界，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数字经济体，拥有的数字跨国公司也最多。凭借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美国和美国数字公司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对美国有一定抗争能力的欧盟国家一直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二梯队。为了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同时给本国民族资本争取数字经济发展空间、保持经济独立性和安全性，法国等国家宣布征收数字服务税，主要针对的就是以美国公司为主的国际垄断资本。按照法国的数字税法案相关条件，有 27 家数字公司符合法国征收数字服务税要求<sup>③</sup>。其中 17 家为美国公司，占到约三分之二<sup>④</sup>。针对法国等欧盟国家征收数字税的行为，美国通过启动“301 调查”和提高其他商品关税等行为予以反制。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主要发达国家之间为争夺数字经济相关的利益而展开的较量，是这些国家瓜分数字经济的世界市场的最新表现。在列宁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同盟为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而展开尖锐的斗争，甚至是战争。当今主要发达国家和金融垄断资本瓜分的对象是世界市场。具体到数字经济领域，他们瓜分的是市场份额和国际税收等。列宁在论述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时指出，资本家会围绕瓜分“势力范围”展开斗争，同时深刻地总结道，“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sup>⑤</sup>。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垄断同盟之间仍然存在着为争夺经济利益而

① 参见〔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② 参见肖巍、钱箭星：《从美国不平等扩大看政府的作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③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Report on France’s Digital Services Tax”,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Report\\_On\\_France%27s\\_Digital\\_Services\\_Tax.pdf](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Report_On_France%27s_Digital_Services_Tax.pdf).

④ 另外的公司为：中国 1 家（阿里巴巴），西班牙 1 家（Amadeus），德国 2 家（Axel Springer 和 Zalando），荷兰 1 家（Randsstad），挪威 1 家（Schibsted），日本 2 家（Rakuten 和 Recruit），法国 1 家（Criteo），英国 1 家（Travelport）。

⑤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39 页。

进行的激烈斗争，美国与欧盟国家之间的数字税之争就是其真实写照。

#### 四、中国应对：以“共建共享共治”的理念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逻辑推动着平台经济全球化，实现了数字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推动了一般性生产关系和“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局部变革。在数字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了，使得剥削、收入分配差距、垄断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随着资本积累的矛盾不断深化，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公平问题日益突显，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资本主义通过平台垄断和“剪息票”等方式维持着腐朽的统治。如果任由资本逻辑推动平台经济全球化，必将导致垄断，垄断又会产生经济停滞问题。因此，为了实现全球数字经济的共享发展，我们必须超越资本逻辑，倡导“共建共享共治”的合作发展逻辑，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积极推动世界各国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该坚持的四项原则：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建立良好秩序；同时就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打造网络文化交流平台、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保障网络安全、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等提出了五点主张；重点提出要倡导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sup>①</sup>。此后，在历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致辞或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都积极倡议世界各国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积极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也是有效途径之一。“共建共享共治”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则。“共建”需要世界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加强合作，实现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享”需要世界各国，无论大小、贫富都可以平等地获得数字经济发展机会，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共治”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共同面对数字经济发展中技术、安全、冲突和治理等问题。只有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扩大合作，坚持“共建共享共治”理念，努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才能形成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才能解决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网络空间治理赤字问题。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在“逆全球化”和世界大变局中，中国平台型的数字公司全球化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为了全面遏制和打压中国发展，美国政府采取霸权主义行径和国家干预主义对中兴和华为等高科技公司，以及TikTok和微信等数字平台进行打压，严重违反了国际规则和市场经济公平原则。除此之外，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印度等周边国家采取民粹主义行为禁止或下架中国数字企业产品和服务，使得中国数字企业面临着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数字企业采取的非公平竞争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公司利益。为了配合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打压，脸谱等公司借助政府干预和模式抄袭等方式围剿中国数字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三是法国等国家将要征收的数字服务税使得阿里巴巴等中国数字企业面临着国际税收新挑战。从具体对策层面而言，为了积极应对我国平台型数字企业全球化面临的挑战，可以从三个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首先，从国家层面维护我国平台型数字企业在海外的发展权利和经济利益。从经济全球化的历

<sup>①</sup> 参见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

史经验来看，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具有两个层次：一是在既定国际格局和秩序下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二是市场竞争之上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军事竞争。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是国家之间竞争的基础，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会影响企业之间的竞争。随着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压和遏制，以及印度等国家民粹主义情绪的出现，中国数字企业在美国、印度等受到了政治审查、强制退市和限制交易等不公正待遇，这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影响到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典型事件。在这样的事件中单靠企业无法对抗美国等国家的政治干预，中国政府必须通过国际组织申诉、政治谈判、经贸协商、合理反击和补贴性支持等方式，帮助和支持本国数字企业维护海外发展权利和经济利益。

其次，平台型数字企业要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培育全球化竞争新优势。面对国际垄断资本与民族资本的矛盾，中国平台型数字企业需要加强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以形成核心竞争力，重塑供给链以提高有效供给，打造产业生态价值体系以提高产品附加值，积极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依托“东盟”和“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实现平台经济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发展。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数字企业要与国际资本展开竞争和合作，通过竞争促进自身发展，通过合作获得共同利益。

最后，中国要积极倡导公平公正的国际税收治理新秩序，通过国际税收谈判为我国平台型数字企业全球化提供良好国际税收环境。法国等欧盟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宣布的数字服务税征收方案，会对阿里巴巴等中国数字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发展权利和经济利益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应该依托“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率先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之间达成数字服务税解决方案；同时通过与欧盟相关国家的国际税收谈判为中国平台型数字企业国际化获得更多的发展权利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 参考文献：

- [1]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 [3] 马昀、卫兴华：《用唯物史观科学把握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 [4] 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 [5] 鲁品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飞跃》，《哲学动态》2018年第3期。
- [6] 黄再胜：《数据的资本化与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新特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 [7] 周文、韩文龙：《平台经济发展再审视：垄断与数字税新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编辑：张建刚）